

流量社会背景下 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境遇与应对策略

■ 张 瑜 石秋怡

(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下,流量社会迅速兴起,其基于快速、大规模的信息数据流动而整合。流量生产、传播与消费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行为与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从教育场域、教育方法和教育主客体方面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供了新机遇。然而,流量社会在为思想政治教育创造发展契机的同时,受到算法调配追求流量至上、流量传播追求娱乐至上、平台运行追求资本至上三种逻辑的支配,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着教育目标被侵蚀、大众价值取向庸俗化娱乐化、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传递受阻等困境。面对这些新情况,新时代需要积极应对流量背后的价值挑战。我们需要以主流价值观驾驭算法,推动流量“至上”向“向上”转变;以文化育人纠正过度娱乐化,引导流量“乱流”向“善流”转变;采取多元举措营造正能量场域,促进流量“增殖”向“增质”的转变。

【关键词】流量社会 思想政治教育 现实境遇 应对策略

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要阵地,为了牢牢掌握舆论场的主导权,我们必须加强并扩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的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正能量产生大流量,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1],这是我国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的关键举措,我们必须以优质平台为媒介,聚合思想力量,并以价值导向驾驭信息流量。伴随着信息技术升级和移动智能设备普及,人与数字网络交互加深,每个人的生活都与流量高度融合。在词源上,“流量”一词来源于水量测量,反映的是单位时间内通过河流某一横断面的水量。社会科学中的网络流量,是指以网络点击量为直接度量单位,通过浏览量、转发量、点赞量等数

收稿日期:2024-03-20

作者简介:张 瑜,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石秋怡,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思政课教师网络育人能力提升研究”(课题编号:23JDSZKZ09)、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基于微博大数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研究”(课题编号:21KDB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据反映网络行为数据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流量明星”“流量艺人”“流量大V”“流量平台”等概念正是指代具有用户吸引力的事物。流量从最初信息传递的数据表现,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塑造社会与个人的力量,其“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用以“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2]。由此,一种网络社会演进过程中的新形态——“流量社会”被提出。有学者基于曼纽尔·卡斯的“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概念,提出流量社会是网络社会与消费主义融合中产生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既是信息资本主义在具体社会层面的反映,也是信息流动、商品生产与消费、资本流通与积累深度结合的变种”^[3];有学者认为,流量为人们深入理解网络社会的结构特征与运行秩序提供了重要的钥匙,信息生产的流量化以及流量的符号价值化逐渐成为塑造网络社会空间运行秩序的重要机制^[4]。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借助政治经济学对“流量社会”进行解剖,提出借助移动数据流量这一商品,网络空间成为“流动的流动空间”,人们日常生活的碎片化时空被整合为生产领域^[5]。总之,流量社会是一种通过快速、大规模的信息数据流动而整合的社会类型,它以数据流量为标准,以注意力捕获为手段,通过参与式文化和体验式消费将每个人纳入其中,借助海量数据流动从而获得商业利益。在这里,流量既是信息的流动,也是商品与资本的流通,更是思想观点与价值观念的流动,流量重新建构出一套全新的整合机制,流量社会中“流量为王”的价值观念影响着线上线下空间的文化环境和个体认知。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已经被卷入到流量社会所引发的变革之中,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流量社会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数据—流量”的技术模式被视作为教育的新技术、新方法并得以广泛运用,“数据流量的关注逻辑”已深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6]。虽然“流量效应”对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效果具有重要价值^[7],但是网络空间中基于“流量为王”的优先排序排挤着主流意识形态内容^[8],作为传播意识形态的主渠道,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积极应对“流量至上”价值准则的现实挑战^[9]。因此,如何应对流量社会的发展机遇,树立正确价值观,摒弃“流量至上”思维,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这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回应的重要课题。

一、流量社会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机遇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流量已融入民众生活,其流量生产、分发与消费促使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转变,进而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社会环境。在流量社会科技与传播的推动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其活动效能从教育场域、教育方法、教育主客体互动等方面均得到显著增强,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时代的发展机遇。

(一)流量生产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施场域拓展

思想政治教育实施场域作为教育活动发生和实施的地点,既包括学校、社区等固定机构和地点,也涵盖着网络思政平台、公众号等在线空间。在流量社会兴起前,思想政治教育场域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这些教育场所、组织或平台通常长期存在,管理和组织方式的稳定性、连续性都相对较高。然而,流量社会下流量生产为教育场域拓展提供了机会。从实践维度看,流量社会的运行依托于网络平台,以捕捉注意力为手段,通过参与式文化和体验式消费将民众纳入

流量创造中,借助海量数据流动从而获得商业利益。正是由于对于数据而言,“任何发生在互联网空间的数字行为都是对它的‘塑形’”^[10],因而民众在浏览、消费网络信息时,其每一项行为都参与到流量生产中,“无论他们在网上做什么,他们都是在创造内容”^[11]。这种流量生产特点显著,信息快速传播,热点迅速更迭,随着网络舆论的聚集与发酵,网络空间逐渐形成舆论场。而流量自身带有马太效应般的聚集效果,热点话题在点击、阅读、转发等行为的推动下,展现出贯穿线上线下广泛的影响力。

在流量迅速变化与热点频出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实施场域日益呈现出其动态性与灵活性。从动态性维度看,动态发酵的流量热点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实施场域的动态延展性。流量不仅是数据的集合,也是群体的集合,而流量热点代表着民众的广泛关注,这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更广泛的传播平台。通过参与热点话题的讨论或发布相关内容,教育者可以将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传播给更多的人群,将“热点讨论场”引导为“交流探讨场”,推动构建网络育人新场域。从灵活性维度看,灵活流动的流量热点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实施场域的时空灵活性,流量以动态数据形式在民众生活中流动,成为沟通虚拟与现实教育场域的重要载体。流量具有可感知性,网络空间中网民热烈参与的话题,其内容也会引起线下激烈的讨论;网红名师的线下课程也备受追捧,优秀的线下课程也会得到网络宣传;当社会热议的话题形成热搜后,也将引起学生的关注。这些话题、价值观、争论等在网络空间与现实场景之间广泛传播,流量的多维联动为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更为广阔的教育空间。

(二)流量分发为思想政治教育精准滴灌提供方法

由于教育的多样性,学生各自的特点源于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成长环境。面对这种多样性,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不能“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12]。从技术角度看,流量社会正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因材施教的要求。流量社会的兴起依赖于移动网络技术的优化、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伴随着4G、5G技术迅速推进和无线网络大面积覆盖,智能移动设备在民众中得到普及,形成了微博、微信、抖音等移动端资讯聚合型平台。为了应对资讯聚合型平台的信息超载问题,在流量社会中采用了多样化信息管理手段:这些手段包括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推荐算法,通过投其所好争取更多受众;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通过筛选与过滤社会信息实现信息内容自动分发;基于流行度算法的推荐系统,借助热搜排序、话题因子、互动因子等手段,有效传播信息资讯。

通过使用多样化的信息管理手段,信息传播展现出统筹性、个性化、精准化的特点,更能满足教育对象差异化、个性化的信息需求。流量运行的技术手段及分析方法,为思想政治教育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提供了有效方法。一是算法分析技术为精准识别教育对象提供有力支撑。为挖掘用户的消费潜能,流量社会常常使用算法分析技术对用户数据进行采集、分析,这为思想政治教育精准识别教育对象提供了技术渠道。教育者利用人工智能在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等方面的优势,可以进一步分析教育对象的页面浏览数和访问主题等数据、关注和爱好等个性化特征数据,对教育对象的思想变化进行追踪,精准识别教育对象个体诉求,从而为有针对性地教育提供决策参考。二是内容分发技术为精准供给教育内容提供渠道。流量社会中海量的数据由静止堆积到活跃流动,都离不开内容分发技术。正是在此基

基础上,流量社会才能智能化匹配数据和信息,生成符合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信息推荐。思想政治教育借助内容分发技术,能够实现受教育者个性化需求,精准定制学习方案、精准输送精品课程,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达率。同时,以 ChatGPT、DemoFusion、Sora 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打破了内容获取的思维定式,受教育者可以主动输入获得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内容,将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有助于满足受教育者的多样化内容获取需求。三是流量分级思路为精准引导思想观念提供方法借鉴。流量分层分级是流量社会中实现商业经营的重要策略,即通过有步骤分类、引导,与不同层次的用户建立关系。同样,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需要思考受教育者与课程的关系。对于任何教育内容,受教育者都需要经历一个“知(听到)、情(听进)、意(认同)、信(坚定)、行(践行)”的深化理解过程。但这是一个理想的过程,并不是每个受教育者都会达到最后的践行阶段。因此,需要根据教育内容难度、受教育者对课程及教师不同的了解程度、认可度等,对受教育者进行细化分类,并据此设计不同的教育策略。当前,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具有推理、归纳、经验学习的能力,可以根据不同领域用户的以往行为数据记录,提供分层划分依据,并根据新用户的基础数据,实现精准的分层匹配。这使得教育个性化引导成为可能,教育者可以按照知识学习的分级链路,对照去看每层受教育者的特征及需求,了解受教育者所处的学习阶段,总结出受教育者从“熟知”到“真知”的学习路径,通过自动化评估、研判发展趋势、定制学习规划、针对性问题辅导等措施,让更多受教育者逐渐向深层次学习转化,从而达到教育目的。

(三)流量社会赋予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新表征

随着流量社会的兴起,作为描述网络行为的重要数量指标——“流量”,既代表着传播内容的流动与传播形式的更迭,也凸显着注意力经济的兴起与网络商业平台的竞争,更包含着思想观点与价值观念的传播。流量逐渐成为一种话语权的象征符号,某一领域或圈层内的流量拥有者常常影响着该范围内民众的价值判断,如制造出“美、丑”“高级、低级”“流行、过时”等不容商榷的主观标准。由此,从观念维度来看,流量社会影响着社会公众的认知理念、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

具体来看,流量社会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特殊的时代印记与身份标识,不仅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本身的个体特征、认知模式,也在实践基础上影响着主客体之间的交往与互动。一是从个体特征来看,流量社会赋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独特的思维方式与能力素质。在流量社会中,信息数据的流动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因此,追求更大规模的信息流量、更快速度的信息生产成为平台运行的核心目标。在这种条件下,社会民众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追寻热点的特性。为有效避免被流量牵引和控制,不同社会群体如何提升数字素养已成为亟须面对的现实课题。2022年11月,我国教育部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对于教师的数字素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不仅要提升对新型数字技术的运用能力,更需加强对技术的理性认知和批判思维^[13]。在实践锻炼中,教育者通过提升数字素养,不仅拓展了自身的思维方式和能力素质,还显著增强了信息素养与媒介素养。他们通过教育教学活动,揭露了流量背后消费资本与信息资本的操纵本质,进而引导受教育者逐步形成辨别能力与判断力。二是从认知模式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在认识

世界和他人的过程中呈现出新的评判标准。日益增多的数据种类反映着民众的社会行为,这些数据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对于社会而言,流量对于商业模式、社会结构分化产生深刻影响;对于个体而言,能否获得流量关注,成为重要的个体数字资本衡量维度。在流量社会中,个体对个体的评价不仅会考虑其所具有的数字素养(技能),而且会综合其所具有的数字资本(流量)。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只要提升数字素养及资本,就有机会通过高质量的内容获得流量,从而获得流量社会下的数字权力。三是从交往互动来看,流量社会塑造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多元互动的交往实践关系。流量集聚实质上是一种群体现象,背后代表着网络群众的潜在需求与兴趣。在承载着海量信息的网络空间中,如何快速、精准吸引目标群体的关注成为获取流量的关键。在此背景之下,准确凝练观点、符号化概括立场成了获得关注的重要途径,而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交往实践也不可避免受此影响。一方面,通过对符号化观点的总结,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能够灵活把握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进而改编、重组大众观点,以加强与教育客体的思想和情感交流。另一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教育主客体可以借助符号化内容开展交流,并以网络热词的符号形式快速传递内容,并在对符号的解读、重构中凝聚共识。

二、流量社会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审视

在数字时代,个体的价值判断、认知思考无时无刻不受到外界信息的介入和干扰^[14]。在资本和算法的运作下,流量至上、娱乐至上、资本至上三种逻辑在流量社会中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着内容的产生、传播和消费。这三种逻辑共同塑造了流量社会的特征和行为准则,构建出一种泛娱乐化、非理性化的社会环境,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算法调配追求流量至上,侵蚀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教育目标

从互联网与大数据的发展到元宇宙及VR/AR增强技术的兴起,再到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升级,新时代要“发挥融入式、嵌入式、渗入式的立德树人协同效应”^[15],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的有机结合。然而,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流量社会下算法计算追求“流量至上”的现象,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其功利化倾向更是对立德树人这一根本教育目标构成了挑战。

“流量至上”指的是在网络环境下,不关注传播信息的内容、观点表达的过程,而仅仅将获取点击量、观看量、转发量等作为最高追求的一种现象。这意味着网络平台或者内容创作者为了获取更多的用户,将流量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指标,而不考虑内容的质量、深度或者对用户的实际益处。算法作为自动化的决策系统,其目标往往是根据用户的行为模式,为用户推荐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在“流量至上”的逻辑下,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用户的参与度和停留时间,算法往往会偏向推荐那些引人注目、情绪化、易引起争议或者点击率高的内容,以引起用户的兴趣或争议,而不是推荐那些更为深入、理性或理论化的内容。与此同时,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各种聊天机器人以“助手”“伙伴”的角色进入民众生活,从技术上进一步助力了虚假信息的生成、散布,以及流量刷榜和灌水现象。究其根本,“流量至上”问题的实质是“工具理性逐渐僭越了价值

理性而成为数字技术运行的基本逻辑”^[16]，“资本增殖欲望和资本至上的价值误区支配和操控着数字技术的设计和使用主体”^[17]。

此时,这种“流量至上”的追求导致平台上所有信息都服从于算法机制的调配,以实现最大化的流量积累。在算法技术异化与平台物化用户的双重影响下,民众成了贡献流量的生产工具。一方面,流量以消遣性的娱乐方式削弱了民众的理性判断,使他们无意识地参与到流量制造中,无法分辨历史虚无主义、低级庸俗的信息,缺乏对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严肃思考。在优质内容与猎奇消息的交织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内容难以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政治素质,导致非理性观念引发网络乱象,如人肉搜索、造谣攻击、不当消费等。另一方面,受到流量利益的诱导,一些网络活跃用户一味追求曝光和关注度,甚至采取戏谑历史、歪曲事实、贬低经典等不当手段制造社会热点以影响大众舆论,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受到挤压和排挤,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的影响力被淡化和遮蔽。

(二)流量传播追求娱乐至上,诱导大众价值取向庸俗化娱乐化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18],如何做好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重要任务。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关于互联网内容建设与管理的行动,打赢了一系列网上重大斗争,根本扭转了网络乱象丛生的局面。然而,当前在资本与消费的双重影响下,流量社会仍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风险挑战。

“娱乐至上”指的是将娱乐性视作文化评价和内容传播的最重要价值标准。在流量社会中,个体是数据的生产者和制造者。资本为了达到增殖的目的,需要通过精准投递将个性化数据信息推送给每个人,从而尽可能增加流量生产的劳动力。因此,商业平台常常通过“热度”“推荐”等方式,让大众沉浸在算法技术所编织的“娱乐茧房”中,从而扩大流量生产规模。同时,社会中也呈现出“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泛娱乐现象。在资本不断推动下,文化生产者以理念与概念包装作品,构建完整的利益链条,这导致文化生产的目的逐渐偏向经济利益,市场成为衡量文化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

在此背景下,一批缺乏思想内涵的低质量文化产品悄然走红,通过注入低级趣味、猎奇及暴力等因素来吸引人们的关注,不断腐蚀着民众的精神世界,冲击着主流价值观。一是庸俗化内容会导致教育对象价值判断能力下降。社会关注度极高的话题屡屡被网红博主们“消费”,以流量为追逐目标的信息投送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以丑为美的特点,导致民众价值判断的标准模糊、混乱,使民众更容易接受表面浅显、娱乐性强的内容,而忽视深刻的思考和理性的判断。例如,在“秦朗丢作业”事件中,千万粉丝级网红博主编造系列视频脚本,网购寒假作业本摆拍,为了追求流量不惜编造虚假信息、传播谣言。二是过度娱乐化教育会削弱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若是采取娱乐化的教育方法,一味迎合受教育者娱乐化的需求,推出娱乐化的课程,即主要内容不涉及严肃的学术讨论或深入的思想探讨,而是以名人的轶事、趣闻或幽默故事为主要内容,虽然这类娱乐化的教学方法会在一定程度上吸引教育对象的关注,但它们往往缺乏真正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深度,必然会导致教育内容的表面化和肤浅化。三是快节奏的碎片化传播会削弱大众理性判断能力。当前,短视频传播具有短平快、碎片化的传播特点,内容多以有趣、轻松的话题为主,编辑、篡改、裁切等断章取义的做法时有发生。在碎片化

信息流的影响下,人们通常只能对信息进行表面性的了解,不愿花过多时间去消化深度的信息,难以形成完整的认知体系。这可能导致民众对客观事实产生误解,缺乏理性思考,从而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培养教育对象批判性思维和判断能力方面所设定的目标。

(三)平台运行追求资本至上,阻碍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传递

“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19],数字平台既是意见阐发、信息接收的重要载体,也是价值碰撞、情感交流的重要空间,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平台。当前,流量社会处于网络媒介极度发达的状态,流量的生产与转移从一开始就与网络媒介息息相关。在Web 2.0时代,伴随着社交数字化的发展,社交媒体平台就成为流量生产与转化的重要平台。在从Web 3.0时代迈向Web 4.0时代的过程中,虚实结合的媒介技术运用为流量的可感知化提供可能,平台流量作用的范围扩散至社会运行的多维时空场景。然而,目前“互联网的软、硬件技术发展到了平台阶段,已经不是个人获得文化、经济或政治权力的理想场所,而是资本主义行为者的竞技场”^[20]。

“资本至上”指的是数字平台在运营过程中,将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积累置于首要位置的现象,这意味着平台更注重获取广告收入、增加流量变现和提高盈利能力,而忽视了其他价值和影响,如内容质量、价值引导和社会责任等。在流量社会中,数字平台成为流量的入口,“资本以平台为载体,平台以资本为依靠”^[21],资本的逐利性不断推动着平台“通过内容生态的构建、巨大流量的支配以及智能算法的推送,完成短视频文化商品生产、流通、消费”^[22]。

于是,平台运行的经济利益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矛盾,数字平台原本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助力,但在追求资本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平台更倾向于迎合市场需求,阻碍了高质量教育内容的传递。一是从内容供给的角度来看,一些平台为了增强用户黏性,通常会迎合用户的审美趣味,只推荐那些“符合用户偏好”的内容,而不关注用户“应该接触”的内容。这种做法会导致用户只在一个价值趋同的“内容池”里,缺乏了解和接触不同观点的机会,形成“信息茧房”和“信息圈群”。而平台壁垒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对民众的影响,阻碍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广泛传播。二是从话语供给的角度来看,个别平台为了增加用户数量,甚至会采用一些夸张、调侃、荒谬口吻等手法,吸引用户的眼球和注意力。这种错误做法冲淡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严肃性。当前,调侃化、戏谑化政治的言语具有一定的隐匿性、感染力。在资本的推波助澜下,一些西方普世价值观念被裹挟在网络热点议题当中,以青年人使用和认可的网络流行语、表情包等形式影响着人们的思考方式和价值判断,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塑造主流意识形态、增进社会凝聚力的作用相背离。三是从话题设置的角度看,个别平台为了实现流量变现,会有意识地选择和推广与消费相关的话题,引导用户进行消费行为,试图将用户的关注度转化为经济收益。例如,一些平台通常会出现与购物相关的内容,比如时尚博主的推荐购买清单、美妆达人的产品试用分享等,引导用户关注和模仿这些消费行为。这使得平台在教育内容和价值观的传递上抛弃了原本的导向责任,鼓吹只有通过消费才能彰显自我存在的价值,促使人们过度追求物质享受,形成追求享乐、以消遣为目的的消极人生态度。

三、流量社会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应对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工作是要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23]在流量社会中，民众的价值追求易受到大众情绪和消费资本的操纵。在当代，如何在流量社会中避免思想政治教育的失焦、失声，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网络化、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课题。新时代只有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锚定流量背后的价值挑战，以主流价值观驾驭算法，以文化育人纠正过度娱乐化，以多元举措营造正能量场域，才能引导“大流量”变为“正能量”，以“善流”赋能思想政治教育。

（一）技术矫治：以主流价值观驾驭算法，推动流量“至上”向“向上”转变

思想政治教育应成为流量的引力，而不应被流量所驱动，过度追求点击率、观看数等数据指标。在流量社会中，虽然算法和平台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更有效地传播信息，但如果为了迎合用户的偏好而刻意篡改内容或选择性传播，忽视信息内容的质量和价值，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网络内容建设水平，增强网上舆论引导能力。”^[24]数据指标只是衡量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一种方式，而非根本目的，只有用正确价值观指导实践，才能使得教育不被算法所束缚，流量才会成为教育的有益补充，实现从追求流量、流量“至上”到吸引流量、流量“向上”的转变。

一是加强目标导向，增强主流价值观对算法技术的价值引领。流量“至上”、追求流量的思想观念展现出对于流量数据的盲目认同与追捧，要摒弃这种重流量、重数据的认知误区，必须摆正算法技术服务于人的定位，以主流价值观为算法运行设置价值框架。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防止资本至上、一味追求资本增殖的价值误区成为支配、操作算法技术的主导力量，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算法技术运用及发展的导向，使算法技术成为辨析民众思想脉络和需求变化的重要手段，使流量成为反映民众观点共同点、情感共鸣点的重要标识。同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避免算法技术为错误价值观念赋予流量，引导算法设计者、管理者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为算法运行设置价值观指引，规制算法的利益导向、市场导向，减少网络领域中错误倾向的传播、扩散，助力网络价值生态向健康有序方向发展。二是增强内容引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向流量引力。流量“至上”是过于追捧流量数据的极化行为，然而流量数值本身的出现也具有合理性和价值性，在流量数值的背后隐藏着广泛的舆论。因此，在流量社会中，我们对于流量应保持辩证的态度，应该注意提升自身的正向流量的吸引力、引导力，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受力和说服力。一方面，用高质量的内容生产赢得高流量，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感染力、形象化，注重以真实为基础、以共鸣为关键，用生动形象的表达将抽象的价值观念、理论内容传达给受教育者，促进广泛情感共鸣和思想认同；另一方面，用高影响力的内容传播来获得高关注度，在传播体制机制、教育引导方法上持续探索，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向线上扩展、向线下延伸。三是引导技术应用，发挥算法技术流量“过滤网”的积极作用。马克思曾指出，技术在被使用过程中会凸显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算法技术作为一种信息技术，受

到开发者与使用者的影响,实际上蕴含一定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影响。在流量社会中,算法技术已经成为网络舆论运行的潜在规则。为了引导算法技术发挥积极作用,必须构建信息内容“入场—分发—反馈”的全过程过滤网:从信息源抑制负面流量,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针对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制定了相关法律与政策文件,依据规定借助智能化图文识别分析技术对信息发布进行过滤,屏蔽敏感信息、非法内容;从分发机制强化主流价值,《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主流媒体开发了“党媒算法”“总台算法”构建主流价值观知识图谱,并自建智能标签体系,为算法注入主流价值导向;鼓励民众反馈纠偏内容,通过赋予用户“将频道向后调整”及“选择不看”的权利,充分调动民众主动性与信息辨别能力,让他们自主以行为反馈积极修正和优化自身信息接收内容,从而弱化流量中虚假信息及极端情绪对个人的消极影响。

(二)文化提升:以文化育人纠正过度娱乐化,引导流量“乱流”向“善流”转变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功能在于引人向善,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通过教育的引导和教化,教育对象将建立起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正确的道德判断能力。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文化育人的作用至关重要。然而,在流量社会中,文化内容的传播往往受制于资本逻辑,泛娱乐化图景依托科技发展、资本运作、大众需求三方“助力”而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内容往往夹杂着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潮,对社会民众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品位造成负面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25]。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育人显得尤为重要,它能够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引导人们从“乱流”中筛选出正能量、积极向上的内容,引领流量向着“善流”转变。思想政治教育要把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同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养结合起来,让“理性”代替“非理性”,“善流”制衡“乱流”。

一是以理化人,通过理论批判培育民众形成理性精神。理论知识是提高民众认知水平和理性思维能力的基础,理论教育是以文化人的前提。纠偏与引导流量社会中的过度娱乐化,既要明辨泛娱乐化的生成逻辑,又要明确隐匿在其背后的资本逻辑。在流量社会中,受“流量拜物教”所支配,娱乐成为一种资本增殖的工具,其从促进人发展的手段变成满足人物欲享受的目的,为实现娱乐资本的快速增殖提供捷径。以理育人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指导,认清泛娱乐化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特性,揭露其隐藏的本质是资本的无序扩张,引导民众对借以文化形式传播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观点进行深入思考,坚决批判其暗含的消费自由的虚假性。二是成风化人,以高质量文化产品营造良好文化氛围。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网络文化成为一种高度资本化、市场化的文化类型^[26]。在流量社会中,文化产品一定程度上从人类的精神食粮降格为纯粹的敛财工具,出现了各类浅薄、庸俗的文化产品。面对各类文化产品,教育者、新闻工作者、文化创造者需要牢记“成风化人、凝心聚力”的使命,生产内含正能量的文化产品,发挥文化产品启迪、教化民众的社会功能。同时,生产凝聚民心、符合民意的文化产品。人民立场是娱乐文化生产的关键,要构建符合人民群众需求的娱乐文化内容供给,使得娱乐作品能够切实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观照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破除“资本凌驾于民众的需求之上”的异化娱乐价值标准。三是以措纠乱,以处理举措、专项行动等行为整治文化乱象。一方面,发挥主流媒体引领社会风气的作用,遏制泛娱乐主义、文化消费主义的泛滥,主流媒体应强化社会

责任意识,积极配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进行新闻报道和时事点评时批判错误的文化消费行为,对典型案例进行深入报道,引导民众理性消费,发挥媒介育人作用;另一方面,消解泛化娱乐滋生土壤,目前我国已颁布《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强化科技伦理制度和推进“清朗”“净网”系列专项行动等,未来需进一步惩治由流量引发的网络乱象,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源上消解泛化娱乐的传播空间。

(三)生态建构:以多元举措营造正能量场域,促进流量“增殖”向“增质”转变

当前,我国网民规模不断增长。据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截至2023年12月已达到10.92亿人^[27]。这意味着网络舆论对社会的影响力和覆盖面日益广泛,网络舆论场域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空间。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场域承载着师生互动、思想碰撞、价值观念传递等重要功能。公共行政学中的“公共能量场”概念,深刻地阐述了场域的复杂性和影响力:在这一场域中,话语表达往往蕴含着一定的价值目标,身处场域的受众通过媒介传递的信息接收价值能量^[28]。正能量作为一种积极健康的舆论力量,对于促进民众思想观念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因此,营造正能量场域,已成为当前网络生态治理的当务之急。然而,在流量社会的背景下,资本与算法的结合重塑了网络信息传播格局,使得舆论场域面临着诸多挑战。当前,流量变现成为数字平台舆论传播的首要目标。实际上,流量“增殖”并不一定意味着舆论的“增质”,反而可能加剧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和碎片化。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必须强化中国共产党对网络舆论场域的领导地位,确保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利益成为数字平台的核心。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充分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共同建构起有助于正能量舆论场效应发挥的良好网络生态,使得数字平台充盈正能量,提升传播内容的价值含量和价值增量。

一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巩固正能量的“话语场域”。“场域内的博弈焦点是资本争夺,也是话语权的争夺”^[29]。因此,构建正能量场域必须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伴随着“热搜”“热点榜单”的兴起,信息流通的实时性、开放性、交互性迅速增强。主流媒体要占领话语权的高地,必须迅速地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斗争的先机,主动发声,积极参与互联网舆论博弈,并及时回应核心问题,以确保正能量占据话语主导权。此外,在流量社会背景下,人们更倾向于关注简单直接、易于理解的内容。理论说教往往需要较高的认知能力和时间成本,这与人们追求即时满足的心态相悖。因此,主流媒体须将理论内容与生活内容相结合,通过生动的案例、鲜活的故事来解释理论,为民众提供更加贴近生活、更有温度的内容,从而增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二是释放数字平台的公共性,建构正能量的“传播场域”。目前,绝大多数数字平台都是商业企业,它们的运营往往受到商业逻辑和资本逻辑的驱动,这使得数字平台的公共性不断被商业性所挤压甚至取代。数字平台作为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必须扛起引领价值文化的社会责任,给予真正重要的公共议题更多关注。例如,各种榜单如微博热搜、抖音热榜等,应当反映真正的意见气候和舆论环境,提高民众接触到公共议题的机会;通过设立专门的公共议题板块、加强真实性审核机制等方式,确保民众接触到更具价值的内容,引导社会舆论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三是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形成正能量的“治理场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30]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善,流量乱象已逐步得到有效遏制。但是由于流量的巨大经济价值,如“虚假流量”“流量造假”等商业行为仍层出不穷,目前仍缺乏对暗刷流量行为的有效规制。此外,“清朗”等系列专项行动虽为网络管理筑起了严密防线,但仍存在部分“落网之鱼”,部分社交平台账号为蹭流量编造事实,让事件真相扑朔迷离。对那些恶意蹭流量的行为,一方面,平台方需要及时采取禁言、禁播等方式阻断虚假信息传播、遏制其流量变现;另一方面,官方媒体需要与网信部门相互配合,强化典型案例的处置和曝光力度,形成有力震慑,不断压缩唯“流”是图行为的行为空间。这样,我们才能不断优化有利于正能量传播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的环境,推动流量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转变。

[参 考 文 献]

- [1][2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67页。
- [2]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 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 [3][14] 刘 威 王碧晨:《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载《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
- [4] 杨江华 谢晓琳:《从流量平台化到流量社会化——网络社会空间秩序的生产与变迁逻辑》,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 [5][10] 余伟如:《“流量社会”的崛起及其政治经济学探析》,载《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5期。
- [6] 王瑞芳 徐艳玲:《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模式创新与实践策略》,载《理论导刊》,2024年第1期。
- [7] 崔 聪:《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践论析》,载《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3期。
- [8] 邱 程 彭启福:《数字化生存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实践策略》,载《理论导刊》,2023年第9期。
- [9] 潘文丽 孟 楠:《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的逻辑探论》,载《理论导刊》,2023年第7期。
- [11]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 王志弘 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 [12] 刘仁荣:《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页。
- [13]《教育部关于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的通知》,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302/t20230214_1044634.html
- [15]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97页。
- [16][17] 宫长瑞 张乃亮:《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生成逻辑、问题表征与路径优化》,载《思想理论教育》,2024年第3期。
- [18][19][3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72、471、36页。
- [20] 全 燕:《算法驱策下平台文化生产的资本逻辑与价值危机》,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 [21][22] 刘 震 张立榕:《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文化商品研究——以短视频为例》,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
- [23]《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511页。
-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8页。
- [26] 栗蕊蕊:《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的样态分析与引导策略》,载《思想理论教育》,2020年第10期。
- [27]《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https://www.cnnic.net.cn/n4/2024/0321/c208-10962.html
- [28] 查尔斯·J.福克斯 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 话语指向》,楚艳红 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110页。
- [29] 刘明洋 石芳儒:《本质认知与能力建设:从正能量到大流量的两个关键点》,载《全媒体探索》,2022年第9期。

(责任编辑:韩永涛)